

我们 这些人的 幸与不幸

鄢烈山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我们 这些人的 幸与不幸

鄢烈山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 / 鄢烈山著. — 哈尔滨 :

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317-3847-3

I. ①我… II. ①鄢… III. ①回忆录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3498 号

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

Women Zhexie Ren de Xing yu Buxing

作 者 / 鄢烈山

责任编辑 / 王 爽 张雪菲

装帧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三河市金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172 千

印 张 / 7

版 次 /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847-3

定 价 / 38.00 元

前 言

邵燕祥老师多次对我说，你可以考虑写本自传，把经历和见闻记下来，这件事是有意义的。他并没有说比写时评和杂文更有价值。大家知道，他早几年就声明再也不写反腐主题的杂文了，因为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。重复常识性的思想观念是否有意义且不说，至少这是很多年轻的同道都可以做的，甚至做得更漂亮，他们也还没有产生强烈的厌倦感。

邵燕祥老师生于1933年，比我长一辈，而且作为著名诗人和首都的文化人，交际圈自然比我广泛得多。这些年他写了一系列的自传性纪实作品，先有《沉船》《人生败笔》，继而有《找灵魂》，2014年又出版了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和《〈找灵魂〉补遗》。他根据自己的档案和文献，袒露无遗地展示自己的精神历程：如何进入新中国，自觉接受“思想改造”，到被打成“右派”后如何自我批判，一直到“文革”后的情形（见邵燕祥著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，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）。这就是鲁迅说的“自我解剖”，他把自己当成时代的标本。邵老师的人格令

我敬重。

我信奉与邵先生同样的历史观。不是只有给“帝王将相”作“家谱”的官修正史，才是历史；而给明星、“土豪”立传，虽然比我等普通人更有市场，但那也不过是满足人们对“成功”的向往及对名人的窥探欲。现代史学，重视社会风俗史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。所以，在2011年退休前，我已接受邀请，工余担任个人写史丛书《白纸黑字》的主编。原拟与陈敏兄弟一起，把这套旨在追求“留得下来的文字”的丛书一直编下去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丛书的编辑出版中断了，但民间写史这件有意义的事仍有不少人在做。比如，凯迪网的《百姓家史》，央视的纪录片系列《客从何处来》，唐建光诸位办的“新历史合作社”……

我的人生经历，到现在为止，大体说来，相对那些大起大落、大喜大悲的人而言，是平淡无奇的。

这样的人写“私人历史”，有三种写法。

一种是萧红《呼兰河传》的写法。她写的是儿时生活在呼兰县城（今之哈尔滨市呼兰区）时的记忆。人们如何看戏，放河灯，跳大神，宠爱她的祖父，她喜爱的后花园，等等，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场景。然而，《呼兰河传》虽是散文化的样式，却正如她自己所讲是小说，有很大的文学夸张成分。街道上一个烂泥坑，竟然写了那么多页，以表现人们的贫穷、自欺欺人和缺乏公共精神。这种叙事，不如明人归有光那篇脍炙人口的短章《项脊轩志》情真意切，有私人性，而历史认知价值却是互相

不可替代的。

第二种是那种信史般的编年体，有日记等文献为依据。一些大人物传记，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或有团队帮他考订编年谱，这且不说了。近年，在浙江的《西湖》月刊上，看到我的同龄人董学仁的《自传与公传》连载。他以个人经历为“经”，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“纬”，展现他记事以来的中国社会状态。这种“民间叙事”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。历史不正是由千千万万遭际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个体构成的吗？这样才五彩缤纷，更丰富更接近真实。

第三种就是我这样一事一记，随笔体的了。

我的这类随笔，大多是应约而作，带有专题性，即有设定的主题或题材范围；也有的是感触忒深，把它记了下来。

我的这些生活随笔，即便是叙事性的，也有较强的议论色彩。这与我写惯了说理性的杂文和时评有关。虽然我很欣赏龙应台、刘瑜、林达等女作家寓说理于讲故事之中的笔法，但讲故事不是我的强项，而“好辩”是我的性格。我想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19世纪那些文学名著，常有大段大段的议论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、塑造他理想中一代新人形象的《怎么办》，连书名都是议论性的。

旅美作家林达在2014年最后一期《随笔》上发表的《读王鼎钧随感（之五）》中说：“读（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第一部）《昨天的云》，常常会很感慨，就是许多历史细节，假如我

们的长辈不记下来，我们就不会知道了。”王鼎钧先生与先父同生于1925年，林达与我同辈。后人之视我辈，恰如我辈之视前辈吧。有些历史细节，如果我们不记下来，后人恐怕也不会知道了。比如，本书中我写的“大跃进”年代唱的那些童谣；比如，1958年秋冬，我上小学一年级，适逢搞什么“集体化”加“军事化”，不满七岁的孩子，却要到公社中心小学集体食宿，白天劳动，晚上批斗“右派”老师。

虽然，我没有林达所说的王鼎钧那种“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”，没有论者赞赏王鼎钧著作的那种“文学的求美、史学的求真、哲学的求解”功力，但是，“修辞立其诚”的为文准则，我不敢忘。借一己之受想行识，呈现同代人命运，作为历史见证和人生镜鉴的追求，我与王鼎钧是相通的。

任何回忆文字，取舍之间都难免主观色彩。何况本人的这些随笔，并非完整的自传。有些事写了，有些事还没有写，后者并非刻意回避。比如，我与杂文界前辈和同龄人的交往，新媒体朋友对我的帮助，基本还没有写；许多旅行的见闻与感想也不宜收进这本集子里。

它们可以大体展现我作为一个所谓“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”，出身“贫农”政治成分家庭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村孩子走出乡村后，作为同代人中幸运儿的“新三届”大学毕业生、“国家干部”、信奉“新闻专业主义”的媒体人、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。我身上的这些标

识，在当代中国，可以说每一个都有特定的认知意义。但是，它们有共性也有个性，我的个性可以丰富对它们共性的认识。

这些篇章都是 30 年来陆续发表过的。这次选编时，有合并有增删，争取不重复不啰唆，但为了保持每篇的独立性，有些字句重复是必要的。这样既维护单篇文章语意上的连贯性，也可以让读者像在饭店吃自助餐一样，按照自己的偏好选取。

让我用宋代杨万里同学的这首《闷歌行》作结：“风力掀天浪打头，只须一笑不须愁；近看两日远三日，气力穷时会自休。”

鄢烈山

2017 年 1 月于广州

目 录

001	前 言
-----	-----

故园乡情

003	排湖岸边是家乡
010	我们队的同龄女孩
016	时疫于我
019	靠谁来拯救“沦陷的故乡”
025	我们的童谣
028	乡思，更相爱

求学之旅

- 033 小学时代的美好回忆
- 039 书 隐
- 042 最先的一课
- 045 失而复得的大学
- 048 阴郁日子阳光
- 053 理想的拔节

从业生涯

- 061 赤日下的歧路
- 066 十年梦寻
- 069 我的“白兔记”

人情世态

- 077 我的珍本莎剧
- 080 另一种农民
- 094 我的四个老妈妈
- 118 姐姐们
- 123 涌泉之感

- 135 后 怕
138 武汉杂文家陈泽群
142 三见严秀老师

心路历程

- 153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
164 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
172 我所理解的“理想主义”
175 “温故”昨天，书写“在场”
178 我们的思索与告白
184 知道你的家史吗

附 录

- 191 “天生知青”鄢烈山
200 予岂好辩哉
204 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

故园乡情



排湖岸边是家乡

2011年3月29日，中国佛教协会在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地尼泊尔“蓝毗尼花园”，举行建在那里的中华寺的新任方丈升座仪式，我有缘随喜观礼。一出蓝毗尼的小机场，我就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。

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平原，属该国紧邻印度的鲁潘德希县，一派亚热带风光。路边的芒果树繁花如金粟吐穗，村头田角的三角梅争艳怒放，这与广州和深圳的风景时令相同。而一望无际的田野，“小麦覆陇黄”的景象，却让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湖北江汉平原老家，虽然老家麦收的节令比这里要晚二三十天。路上的牛车，村庄里的茅屋、红砖小楼、鸡犬，田野上的草多水少的灌溉渠，水洼里的蒿草，空中飞翔的鸟雀，样样使我忆念起故乡故物故人故事，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怀乡情感原来是那么强烈！

记忆中的故乡风物，定格在我1978年秋到北京念大学的那一年。

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洪湖之畔的“沔阳州”（现在易名叫仙桃市，据说是因为“沔”字难认，不利于提高知名度，便用20世纪50年代的新县城即城关镇的名字做了县名，后相沿做了市名），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！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洪湖，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属于“我们沔阳”的，因此电影中那个“彭家墩”的招牌冠

的县名就称“沔阳”。该片中的湖区风光和渔家生活，在我小时候是很常见的。我的堂姐夫陈姓“三哥”的家，离我家只有几里路，他们村家家有渔船；他只大我五岁，参军出来前就会撒网捕鱼。

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，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。我熟悉的排湖，方圆百里。1974年在县城读师范学校时，我从同学处抄得一篇老作家碧野写排湖的散文。碧文说排湖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三雄之一、沔阳渔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操练水师的演武场。

到20世纪60年代初，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，虽见不到浩渺接天的湖水了，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。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！碧绿的芦苇林，碧绿的蒿草（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）；成片成片碧绿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，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（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子米，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）；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（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“蹲鸡”下的蛋）；各种各样的野鱼就更多了（若手里带了叉，说不定就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）。

当然，这是我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，遵母命随人去探视父亲的感觉，跟一个旅游观光客的印象差不多浪漫。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，就别是一样情怀了。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，防不胜防，插秧割谷没有人一天不被抽血的；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，天天要打绑腿。二是天还未黑，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了，只好不断烧稻草熏蚊子。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，不论栽秧、割谷，动辄陷到半腰深，生怕沉没下去爬不出来。

那个时代毛主席号召“以粮为纲”、战天斗地“农业学大寨”，要让荒湖变良田。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，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，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“白田”（旱地）。现在状态如何我不了解，据移民的乡亲传信，那里开始恢复生态，

养鱼、种藕。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，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“西溪湿地公园”大，至少比广州为办亚运在珠江新城的花场广场北端，花大价钱人造的湿地要大得多吧！

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，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。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吧，旱地是收割麦子和蚕豆的季节。对于我们小孩子，有趣的是两样事。一是麦穗低头时，到地头垄间找野鸡。说不定哪处麦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，有野鸡正在孵“鸡秧子”呢。野鸡真漂亮，它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，把人都可以看呆。二是割麦时参加大人们赶野兔的活动。发现了野兔，大伙一起拿着镰刀“冲担”围猎。那就看谁机灵跑得快。俗话说“千人赶兔，一人吃肉”，指的就是这种场景：大家围追堵截，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，就是谁的锦标物与盘中餐，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。最刺激的是，割麦时发现了“土聋子”（一种毒蛇），胆大的人就猛地揪住它的尾巴，让它头朝下，抖呀抖呀，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。我不敢去抓，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，那也要一点点胆量。

至于水田，那就别有一番景象了。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做底肥，若种的不是蚕豆（苗）而是“红花苕子”，且成片成片地种，苕子花开时，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深红、浅红或淡紫、金黄的花朵，疑是云霞落九天。那种灵动的美艳，只要看过一眼，你就会终生不忘。待到整田灌水，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一群群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……直教人仙凡莫辨。

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无主江湖了。小男孩对堤岸边的绚烂的野蔷薇花丛、金银花丛是不会有兴趣的。日上三竿之后，手里拎了一根鱼叉到岸边逡巡，可以叉黑鱼。它们喜欢浮上来“晒花”，呆呆地定在一个地方不动。或者跳到浅水堤岸边

寻鳊鱼洞，有本事的一天能捉到十几条大黄鳊。我捉鱼不行，能干的一是采“藕梢子”——循着新出水的尖尖小荷，用脚丫子把“藕儿子”“藕孙子”踩出来，夹出水，有时也潜下水用手扯。再就是找越冬的野茭白吃——野茭白像弹药一样黑，嚼得满嘴泥污一般。这些勾当当然没有采莲、打野鸭、捕大鱼有收获，却是我们那时的最爱与极乐。

这些故乡物事都跟我的童年一样永远地逝去了，不仅是因为我长大了，不仅是因为我远离了家乡。回到故乡，那里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情景。随着水利排灌网络的建立，水系都成了人工操作系统，湖泊都变成了良田。洪涝水患是没有了，平时河渠里几乎没有水，跟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旱季景象差不多。别说父辈吓唬小孩的芦苇荡中的豺狗早已绝迹，成群的野鸭、鸭鸡、樟鸡、野鹤不复出现，就是野兔、翠鸟甚至喜鹊、麻雀、大水蛇、“土聋子”都成了稀罕之物。小孩子们嬉水、捕鱼捉虾都成了奢望。举目所见，除了村落就是村落，除了人还是人。近年家乡还多了一种新玩意——除草剂。那东西毒性强，路边的野草沾了它也会枯黄，而农药瓶、除草剂瓶子随处可见。写到这里不能不说，在人民公社时代，人们不仅缺粮食吃，也缺柴烧。我们放学后到处拾柴，包括到路边和堤渠边割杂草、冬季铲草皮。如今，干涸的沟渠边杂草半人高，也没有人砍，有的人家甚至把庄稼梗一把火烧掉沤肥。可见，就此而言，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不好！

别人说“故乡沦陷”，与我的心情有两点不一样。

一是，我不是一般地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惋惜，而是对我的家乡作为血吸虫重疫区充满恐惧和厌恶。在我们那里，下水田干活的人极少有不得血吸虫病的。我亲眼见到好几个乡亲盛年而逝，家人把他们床上铺的稻草当众点火烧掉以驱邪。先父不寿也与血吸